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六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

漢藏語言的研究和問題*

馬 學 良

漢藏語言是中國各民族使用的主要語言，也是東南亞各國使用的重要語言，它的研究具有世界性。中國是漢藏語言的集中地和主要分布區域，中國研究漢藏語言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卓越的成就，特別是49年以來，更是獲得了長足的進展。中國漢藏語言的研究經過半個世紀的實踐，基本上弄清了中國漢藏語言和方言的情況，解決了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實際問題，豐富了普通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並在音系學、類型學和語言關係研究等諸多方面作出了應有的理論貢獻。本文重點討論了漢藏語言的發生學分類、族際共同語、標準語、語言影響與雙語的關係、語言與方言等問題，也提出了研究漢藏語言的基本特點、溝通漢語與民族語言之間研究、開展漢語與民族語言以及民族語言與民族語言之間的比較、加強與其他學科的結合和交流等研究漢藏語言的重要方法和途徑。

一

漢藏語言是漢藏語系語言的泛稱，語言衆多，歷史悠久，幅員廣大，是中國各民族使用的主要語言，也是東南亞各國使用的重要語言，屬於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之一。漢藏語言的研究具有世界性，歷來是世界語言研究者所關注的重要領域，研究深入、成果卓著。從研究規模、參與人數、深入程度和已有成就來說，可以分爲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漢語，另一個部分是漢語以外的其他漢藏語言，由於漢語在這種兩分法中的特殊地位，漢藏語言研究無論從研究的對象、目的、重點、取向乃至方法無形中形成了兩個領域，鑒於討論漢語及其研究的論著衆多，本文所謂的漢藏語言基本上是指非漢語的這一部分，涉及漢語的時候特別

* 本文承藏語文專家瞿霽堂教授提供許多資料，並在探討問題上頗多新意，特此誌謝。

說明，討論的內容則以中國為主。

中國是漢藏語言的集中地和主要分布區域，也是主要使用漢藏語言的國家，56個民族中有32個民族使用50多種（確認的有35種）漢藏語言，遍布雲南、四川、貴州、廣西、廣東、湖南、湖北、海南、甘肅、青海、寧夏、西藏等省區，使用人口不計漢族有4000多萬，僅雲南一省就有20多個民族使用20多種漢藏語言。國外的漢藏語言主要分布在中國南部毗鄰諸國，除少數語言外，這些語言的使用者大部居住在中國，中國的漢藏語言使用者大多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語言，並作為主要交際工具，只有個別語言瀕臨消亡。歷史上，由於中國深厚的文化基礎，在對外交流和民族間交往的語言接觸過程中，漢藏語言對一些非漢藏語言產生過深刻的影響，比如漢語之於包括日語在內的東南亞諸語言，藏語之於蒙古語族的一些語言。以中國漢藏語言內部來說，由於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使用人口和地理位置等多種因素，在歷史上逐漸形成諸如藏語、彝語、壯語、傣語、苗語、瑤語等一些具有影響的區域性語言，通行於不同語言的使用者之中，對周圍同源和非同源的語言都產生過重大影響。漢藏語言不僅是中華語言寶庫的主要成員，也是世界語言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漢藏語言有獨特的語言結構。在語音上，（1）具有聲韻二分的向心音節結構。漢藏語言音節作二元分析，以聲母韻母作為基本分析單位，不是一個操作問題，漢藏語言的聲母和韻母具有形式特徵，並作為獨立單位在發展中得到歷史的驗證；（2）具有與聲韻密切關聯的音節聲調。漢藏語言的聲調是音節的固有特征，使用於音節、詞和句子等多個語言層次，具有辨義和表義功能。（3）具有豐富的雙阻特徵的塞擦單純音；在語法上，（1）單音節語素佔絕對優勢；（2）以虛詞和詞序為主要語法手段；（3）詞、詞組和句子具有結構的一致性；（4）詞組是語法結構的基本功能單位。漢藏語言還具有共同的發展趨勢，比如聲調的產生和分化，複輔音和韻尾的簡化、濁音的清化、形態的簡化和虛詞化、詞序的一致化和語詞的雙音化等。漢藏語言是多元一體的格局，不同的語言具有共同的來源和相似的發展，卻各自都保留了異彩紛呈的特點，特別是藏緬語族語言，具有明顯的粘著語特徵，從共時的觀點來看，與其他語族語言有類型的差異。在漢

藏語言內部，苗瑤語言和壯侗語言比較接近，其次是漢語，差異最大的是藏緬語言。從這個角度說，漢語是漢藏語言同源鏈上苗瑤、壯侗語言和藏緬語言之間的橋梁。漢藏語言獨特的語言結構、複雜的使用情況、深厚的文化基礎和悠久的歷史背景，使它在世界語言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對語言學的發展作出特殊的貢獻。

漢藏語言就其研究範圍來說，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具體語言的獨立研究；二是作為一個語系的綜合研究。中國研究漢藏語言具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周代就有采集方言異語的傳統，漢時揚雄《方言》所記南方各民族的語詞，還有壯侗先民的《越人歌》，藏緬先民的《白狼歌》，都是早期調查記錄民族語言的明證。至於像藏、彝、納西、傣等具有古老文字的民族，無論創造文字之前和之後，對各自的語言都有深入的研究，保存了大量的文獻，特別是藏族，由於受到印度語言文字學的影響，語言文字作為一門學問，是文化知識的一項重要內容，知識階層和宗教職業者的必要修養，流傳下來的語言文字著作，尤其是語法、修辭、詞書等更是不勝枚舉。漢藏語言的科學語言學研究起始於本世紀初，初期研究者大多為非語言專業人員、為傳教等需要記錄過一些漢藏語言，著名學者如伯希和、勞佛等人都曾涉獵漢藏語言，像雷頓（L. Leyden）的《On th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Chinese Nations》（As. Res. X. 1808）在當時就是鳳毛麟角了。不過他們都旨在文化，還不是專門的語言學研究。漢藏語言真正的科學研究應從30年代開始，不僅歐洲有高本漢、喬瑪、孔好古、西門華德等一些知名學者的崛起，中國在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諸先生的倡導下，開始對西部邊陲的漢藏語言進行調查研究，特別是方桂先生對壯侗和藏緬諸語言都有突出建樹，人稱「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是當之無愧的。此後二十年中，除上述三位先生之外，如王靜如、袁家驊、傅懋勳、張琨、金鵬、邢公畹、高華年、馬學良等人都對漢藏語言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取得卓著的成績。當時漢藏語言研究初創，基本上著重於語言的發現和資料的積累，只涉及具體的語言，未能進行深入的比較和系統的研究，限於人力和物力，研究語言的數量有限，而且偏重於藏緬語言，但如方桂先生的壯侗語言研究、王靜如先生的西夏語研究、張琨先生的苗語研究、傅懋勳和馬學良的彝語研究，至今仍是相關專業研究的基礎，起到了筚路藍縷的貢獻。

49年以後，中國的漢藏語言研究進入了新階段，特別是大陸，在政府的領導和支持下，集中大量人力和物力，建立學校，設置機構，培育人才，調查語言，組織研究，發表著作，大力推動和促進了中國漢藏語言的研究。1956年，為了解決少數民族的文字和教育問題，調查了解中國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情況，制訂語言政策和規劃，推動語言研究，抽調了700余人，組成7個語言調查隊，其中有5個調查隊調查漢藏語言，足跡遍及全中國，調查語言和方言土語近千種，藏、彝、苗、瑤等語言和方言土語的調查都在一百種以上。這次大規模的調查，為漢藏語言的研究在積累資料和培育人才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大陸漢藏語言研究的知名學者大多是經過以中央民族大學為首的各級民族院校的專業學習並通過這次調查實踐的鍛煉培養出來的。這次調查包括資料的整理、校對和補充以及有關民族文字的創制、改進和選擇等工作，大多數隊組延續了三四年，有些隊組如雲南各語言的調查隊組和四川彝語的調查隊組在當地成為一個長設機構，到60年代中期才結束。在大規模調查和豐富資料的基礎上，中國的漢藏語言研究獲得了長足的進展。80年代以來，中國的漢藏語言研究界對30多年的研究實踐進行了回顧和反思，一方面深化語言的歷史研究，在描寫研究和資料整理的基礎上，進行歷史比較研究，探討一個語族或一種語言的發展演變規律，構擬共同語形式，提出科學的譜系分類；一方面加強語言理論的研究，在長期實踐的基礎上，對漢藏語言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問題，諸如譜系分類的原則和方法，以及作為漢藏語言重要語音和語法特徵的複輔音、聲母的清濁、元音的鬆緊和長短、聲調、弱化音節、動詞的時態、語態、人稱、趨向、類別等範疇，進行了系統研究和理論探討，以綜合和概括出大量規律性事實為依據，作出科學假設和理論構建。並且進一步拓寬了研究的領域，透過語言和社會關係的視角，對方言劃分、語言識別、語言關係特別是雙語問題、民族語文的使用和發展、民族語言研究與其他學科如民族學、民間文學、民俗學、宗教學的關係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和理論概括。中國的漢藏語言研究有四個特點：一是密切聯係實際。以研究中國境內的漢藏語言為主，緊密聯係實踐需要，解決社會實踐中提出的各種語言文字問題；二是循序漸進，基礎扎實。從廣泛而全面地收集和整理資料做起，通過對語言的描寫研究，在掌握豐富的資

料和對語言有了比較全面認識的基礎上，進行歷史的和比較的研究，探討規律，構建理論；三是理論和方法上以歷史比較語言學為主導，研究語言的系屬、歷史和發展規律，並將共時和歷時研究密切結合起來，形成縱橫交錯、古今結合、自成體系的研究格局；四是在研究方向上，側重語音。這不僅是受中國語音傳統研究的影響，更主要的是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是調查和研究一切語言的入門和基礎；其次，漢藏語言語法結構主要使用非形態手段，在世界形式語法研究強大潮流的影響下，轉移了研究者的視角，再次由於漢藏語言語法上的一致性，大多非漢語語法研究受到漢語語法研究的影響缺乏研究上的獨立性，最後漢藏語言研究中的重大課題，如系屬問題中的同源詞研究，作為漢藏語言重要類型特征的音節結構、複輔音、元音的鬆緊長短、聲調等，都與語音的研究有關，這也是造成重視語音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漢藏語言的研究對語言的實踐和研究至少有三個方面的貢獻：

第一，基本上弄清了中國漢藏語言和方言的情況，收集了豐富的語言和人文材料，並分批公布了其中的主要資料。中國對漢藏語言的調查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30年代上述少數專家學者對壯、苗、瑤、藏、彝、獨龍、羌等語言的調查；第二階段是50年代初對彝、傣、傈僳、哈尼、景頗、阿昌、佤、壯、布依、苗、瑤等語言的重點調查，以及50年代中對全國漢藏語言的全面普查；第三階段是80年代對畚、傈、佯僳、臨高、基諾、克木、普標、爾蘇、木雅、扎巴、卻域、舒興、古戡、納木依、墨脫門巴等語言和阿裏、夏爾巴、巴松、白馬、錯那門巴（以上屬藏語）、浪速、波拉（以上屬載瓦語）、道孚、爾龔（以上屬嘉戎語）等方言的重點補查。這些調查資料大多以三種形式公布，絕大多數語言編寫了概況和簡志，概況除在《民族語文》、《中國語文》等語文刊物上發表外，還有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編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¹《藏緬語十五種》、²孫宏開等《門巴、珞巴、僜人的語言》³等；30多種漢藏語

1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

2 《藏緬語十五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3 孫宏開等《門巴、珞巴、僜人的語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

言簡志則以《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的形式出版；少數語言和方言則出版了調查報告，如喻世長《布依語調查報告》，⁴ 邢公畹《三江侗語》、《紅河上游傣雅語》、⁵ 歐陽覺亞和鄭貽青《黎語調查研究》，⁶ 瞿靄堂、譚克讓《阿里藏語》⁷ 等。而李方桂《龍州土語》、《莫話記略》、⁸ 羅常培《貢山俅語初探》、⁹ 羅常培、邢慶蘭《蓮山擺夷語文初探》、¹⁰ 傅懋勳《維西麼些語研究》、¹¹ 馬學良《撒尼彝語研究》、¹² 袁家驊《阿細民歌及其語言》¹³ 等專著則是第一階段調查研究的成果。此外還出版了不少有關語言的口語和書面語的辭書，特別是與漢語對照的雙語辭書，如苗語方言與漢語對照的四種簡明詞典，壯漢、布依漢、侗漢、彝漢、傈漢、景漢、傣漢、哈尼漢、黎漢等簡明詞典，有些還是雙向的，如漢苗、漢布依、漢傣、漢景、漢彝、漢白等詞典。規模大而有影響的如《漢彝詞典》、¹⁴ 《藏漢對照拉薩口語詞典》、¹⁵ 《藏漢大辭典》¹⁶ 等。此外像漢藏語言包括語音、語法和長篇語料的口語音檔也已初具規模。

第二，解決了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實際問題。通過漢藏語言的調查研究，為壯、布依、黎、苗、彝、納西、傈僳、哈尼、侗等九個使用漢藏語言的民族創制了13種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為瑤、羌等民族設計了拼音文字方案，為傣、景頗、拉祜等三個民族改進了原有文字，也幫助沒有文字又沒有創制文字條件的

4 喻世長《布依語調查報告》，科學出版社，1959年。

5 邢公畹《三江侗語》，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紅河上游傣雅語》，語文出版社，1989年。

6 歐陽覺亞、鄭貽青《黎語調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7 瞿靄堂、譚克讓《阿里藏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8 李方桂《龍州土語》，史語所單刊甲種之十六，1940年；《莫話記略》，史語所單刊甲種之二十，1943年。

9 羅常培《貢山俅語初探》，《國學季刊》1952年7卷3期。

10 羅常培、邢慶蘭《蓮山擺夷語文初探》，北京大學出版部，1950年。

11 傅懋勳《維西麼些語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3卷，1940-1943年。

12 馬學良《撒尼彝語研究》，商務印書館，1951年。

13 袁家驊《阿細民歌及其語言》，科學出版社，1953年。

14 《漢彝詞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

15 《藏漢對照拉薩口語詞典》，民族出版社，1982年。

16 《藏漢大辭典》，民族出版社，1985年。

民族正確選擇了文字，如西南各民族大多選用了漢文，使用嘉戎語、羌語和普米語的藏族選用了藏文等。文字的創制和選擇有很多更為複雜的問題，如標準語的選擇和確定、族際共同語的確立和發展、一個民族創制多種文字、民族文字形式的選擇、規範和統一、同一民族使用多種文字的規範、統一和新老文字的關係和發展、民族語文和漢語文的關係等問題，以及有關的民族教育、語言立法、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大多是通過漢藏語言的調查和研究逐步得到解決的。

第三，豐富了普通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普通語言學歷來就不「普通」，大多理論和規律都是建立在歐洲語言研究的基礎上，所謂語言的普遍現象更不普遍，因為它們是根據局部語言事實概括出來的，特別是亞非拉第三世界語言研究的落後，直接影響了普通語言學的發展，中國漢藏語言的研究正好從一個方面彌補了這種缺陷。中國漢藏語言研究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理論貢獻：

1. 漢藏語言的語音研究對音系學有三個重要的貢獻：一是聲韻調分析方法。這種根據漢藏語言特點所創立的語音分析方法，是與音位分析法相交的一種語音分析方法，也是語音研究及其規律、規則的描寫、解釋、說明和表述的獨立方法，具有音系學的方法論意義。漢藏語言以音位作為最小的語音功能單位，以聲韻調作為基本的語音分析和表述單位，以聲韻調配合為基礎的音節作為音義相交的語音結構單位，充分反映了漢藏語言語音結構的基本特徵，這種三層級分析法不僅表明音位分析法在使用中的局限性，更說明了不同語言的語音結構具有不同的基本功能單位。漢藏語言的聲韻調分析法源遠流長，原來只使用於漢語，後來推及各種漢藏語言，通過長期的實踐，無論對聲韻調的認識和劃分，操作和說明，都更加準確和科學，使它完全適用於遠比漢語語音複雜的各種漢藏語言。二是語音分析上的縱橫相交原則。把一個語音放在共時和歷時的相交點上，視作縱橫共現體，是一個靜態和動態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事實證明，對語音單純的共時或歷時分析，都無法揭示語音的本質特征，也不能把握語音的發展趨勢。在漢藏語言音系學中，無論是聲母（如舌面音、舌尖音和舌根音的關係）、韻母（如圓唇聲母和u介音的關係）或聲調（如入聲、聲調與元音長短、鬆緊的關係）等的處理都將現實、歷史和發展密切結合起來，使得語音系統的結構和描寫更加科學和合理。三

是確立聲調的音位價值，將聲調作為獨立的語音結構要素，充分反映了漢藏語言語音的重要結構特徵，開從音系學角度研究聲調的先河。

2. 漢藏語言類型特征的研究，不僅推動了語言類型學的發展，而且拓展了語言研究的視角，是世界語言學綜合研究和理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是普通語言學真正普通化的前提。漢藏語言作為世界最重要的語言之一，具有獨特的結構和類型特征，在語音上如聲母中的複輔音，韻母中的鬆緊元音，音節上的聲調等。漢藏語言的複輔音聲母是一種向心結構的輔音組合，無論從節律特徵、音素關係、出現位置、變化規律都與一般的所謂輔音叢完全不同，是語音結構特定層次上的一種聲母化的語音單位。漢藏語言中元音鬆緊是一種獨特的語音現象，來源於聲母的清濁和韻尾的變化，以喉部特殊的發音特徵，成為具有音位價值的獨立語音單位，而不同於其他附屬於元音或聲調的伴隨現象，它的發現無論對發音特徵、區別特徵、語音要素、音位處理和聲學研究等都有重要的意義。漢藏語言的聲調是一種音節聲調，與音節共生，跟輔音和元音一樣是一種固定的基本語音形式，在不同的語言平面上多層次使用，具有極強的辨義和表義功能，同其他類型的聲調語言中作為隨機語音手段的聲調或多音節聲調是完全不同的。將聲調作為一個獨立語音要素，並作為特定語音分析層次的一種功能單位，與聲韻放在一個統一的格局中進行研究，是漢藏語言研究對語言學特別是語音學的重大貢獻。與世界不同類型的聲調語言比較來說，漢藏語言聲調是一種與語素相應的音節特徵的聲調模式，由於發生和發展上的多元性特征，聲調與音節中其他音素的嚴格對應關係，發生和發展的機制和規律得到充分的揭示，從而為聲調學 (Tonology) 和聲調發生學 (Tonogenesis) 的創建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在語法上，以虛詞和詞序為主偏重意合的語法格局，是分析結構的一種獨立類型，特別是虛詞具有分析和粘著的兩重性，既不同於綜合型語言也不同於粘著型語言中的虛詞，在語法方式和語法形式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漢藏語言中的藏緬語言不僅具有粘著性，而且還有豐富的形態，如名詞的從屬範疇，動詞的時態、語態、人稱、趨向和類別等範疇，都是形態學的重要內容。

3. 漢藏語言的關係研究拓寬了普通語言學研究的視角，在理論和方法上對普

通語言學起到了充實和豐富的作用。漢藏語言衆多，關係複雜，對語言之間不同關係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歷時關係上，研究語言的起源和發展，系屬和發生學分類。如對漢藏語系的確立、壯侗苗瑤語言的歸屬、藏緬語言的分類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語言起源關係多元論，即語言發生發展中的分化、融合和平行發展等多種起源關係；確立了無文獻語言語詞同源關係的原則及其與借詞的關係；探討了語言融合和換用的原因、機制和過程；在共時關係上，研究語言的影響、雙語、方言、族際共同語、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和發展等，爲語言識別、方言劃分、語言教育、語言規劃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論根據。

二

漢藏語言的綜合研究有一個重要的課題，即語言關係的研究。語言關係是語言靜態和動態、歷時和共時相交的研究領域，語言的共時關係折射出歷史的積澱和未來的發展，語言的歷時關係則是調控語言共時研究的樞紐。這種研究可以分爲兩個部分：一是系屬分類的研究，這是一種歷時的研究；二是如雙語關係、語言與方言、標準語和族際共同語、語言文字的規範和規劃等問題的研究，基本上是共時的研究；還有一些如語言的融合、影響、換用等關係的研究，屬於動態研究，關係到歷時和共時兩個方面。

漢藏語言的系屬問題一度是國內外關注的熱點，吸引了衆多學者的投入，進行了具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探討，雖然還沒有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卻推動了漢藏語言的研究。漢藏語言的系屬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問題：漢藏語系的確立、壯侗、苗瑤語言的歸屬和藏緬語言的分類。國內外學者對這三個問題都有不同看法，存在較大分歧。對漢藏語系存疑，首先以壯侗、苗瑤語言不屬於漢藏語言爲前提，其次是藏緬語言與漢語的差別較大，特別是語法上的差別。持這種觀點的人是少數，因爲即使不論壯侗、苗瑤語言，藏緬語言與漢語的親屬關係，通過同源詞（包括部分語法詞）的比較，信而有徵，確實要比壯侗、苗瑤語言與漢語的關係的可信程度高得多。俞敏先生大量的漢藏比較研究就是明證，尤其是《漢藏

同源詞譜》¹⁷ 更是集其大成。漢藏語言發生學分類研究的焦點是壯侗、苗瑤語言的歸屬問題。以本尼迪克特爲首的西方學者大多認爲壯侗、苗瑤語言屬於所謂的澳泰語系，國內大多學者包括國外部分華裔學者都認爲屬於漢藏語系。同屬於漢藏語系的觀點，對漢藏語言與南島語言部分共同的語詞有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爲是南島語言爲漢藏語言融合後所留下的「底層」，¹⁸ 有人認爲是使用南島語言的人換用當地漢藏語言後所留下的「底層」，¹⁹ 有人則認爲漢藏與南島語言有更高一層的共同母語，即漢藏泰澳語系；²⁰ 同屬非漢藏語系的觀點，對漢藏語言與南島語言的關係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爲由於這些語言的「類型轉換」應稱爲「馬來一支那語」；²¹ 有人則認爲是「聯盟關係」。²² 這些分歧的產生主要是由於：(1) 在理論上，對語言發生和發展的認識不同；(2) 在方法上，對同源詞和借詞、語言和方言區分的原則和標準不同；(3) 在操作上，對同源詞的判定、共同語的構擬結果不同，對比較語言熟悉的程度和所掌握的資料不同；(4) 漢藏語言本身情況複雜，大多語言又無文獻資料，加上不同語言之間同源詞又少，比較的難度就更大。歷史比較語言學中的發生學分類研究借鑒生物學，理論和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有些還涉及到語言研究中有關語言發生和發展的重大理論問題，限於當前的研究水平，還無法進行深入的討論。歷史比較語言學在發生學分類研究中有一些明確提出或隱含的理論原則和工作前提，關係到具體語言的系屬分類，沒有共識就無法討論。現擇要討論如下：

1. 發生學分類在原則上認爲世界語言由少數原始母語（或稱祖語）構成。由於母語是根據現代語言用構擬的方法擬測出來的，語言又是不斷發展的，現代語言中所遺存的歷史積澱有限，不同系屬語言的歷史積澱更不相同，加上語言使用

17 俞敏〈漢藏同源詞譜〉，《民族語文》1989年第1-2期。

18 羅美珍〈試論台語的系屬問題〉，《民族語文》1983年第2期。

19 瞿靄堂〈語言關係研究中的一些理論問題〉，《民族語文》1991年第4期。

20 邢公畹〈關於漢語南島語的發生學關係問題〉，《民族語文》1991年第3期。

21 倪大白〈中國壯侗語與南島語〉，《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第3期。

22 陳保亞〈論語言的接觸與語言聯盟—漢越（侗台）語源關係的解釋〉（博士論文，未刊稿，1994年）。

者的流動和變遷，這種原始母語既無時間性，也無地域性，更無現實性，因此它只能作為比較工作的一種假設的出發點，作用於同系屬語言的縱向比較，補充文獻的不足，對不同系屬語言無橫向比較的價值，也沒有語言原始發生的意義。

2. 現代語言都是從原始母語和生物般分化而來。將語言的分化作為發展的唯一途徑，不僅有違語言發展的事實，也無法解決系屬分類中產生的具體問題。漢藏語言系屬分類中，諸如京語、臨高語、村話、回輝話、五屯話、仡佬語甚至白語等等，難以歸類，都與拘泥於這種語言發展一元論有關。語言不是一種封閉的靜態結構而是開放的動態結構，語言反映自身時間的變化、空間的變異和反饋的變動，語言的發展不是沿時軸的單線變化，而是多維的立體變化，按生物進化模式探討語言的起源就不能正確反映語言之間的各種複雜關係。語言使用於社會，受到社會的制約，接受社會的反饋，這種反饋不僅作用於語言的結構而且作用於語言的使用和功能的變化和發展，語言的單向分化就意味著社會環境是凝固的、定型的，社會反饋是單一的、等同的，否則存在於不同社會形態中的語言就不可能按照一種模式發展變化。研究證明，語言的發展分化只是一種方式，還有產生新語言的融合和合併，改變方向的平行發展等不同的發展途徑。這裡涉及到一個語言質的規定性問題，即語言質變的界限。語言是一種開放的符號系統，加上研究者的不同理論背景，質變的界限就難於量化和確定，更不易統一；語言又是一種交際工具，與使用者有密切的關係，語言的識別和區分常常受到使用者民族、歷史和文化觀念的干擾，形成語言學研究中著名的語言和方言區分問題（詳見下文）。正是由於這種理論上的缺陷，操作上的困難和外部因素的干擾，給語言系屬分類增加了很大的困難。

3. 語言的每一次分化都形成一個層次的類屬，類似生物學分類，如語系、語族、語支和語群等等，一般是三四個層次。這裡隱含著一些不合理的前提：首先，這些類屬的層次是固定不變的，印歐語言如此，漢藏語言也如此，這意味著分化時間上的一致性和程度上的等同性，換句話說，這些語言都在相同的時間發生了質變。事實上，語言發展是不平衡的，不同語言發展速度、變化內容、歷史遺存、現實創新、與其他語言的接觸和所受的影響以及使用者的變遷等各不相同，加上

年代的不確定性，根據現代語言所擬測的共同語的層次不可能是等同的，如擬測的藏緬語族共同語和壯侗、苗瑤語族共同語就不在一個平面上。以藏緬語言分類來說，新增羌語支的觀點，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即所擬測羌語支的語言特徵（尚未見語支共同語整體的擬測），與藏語支共同語特征並不在同一層次上，這也是因為囿於這種固定層次框架的結果。當然，在藏緬語言分類上國內已有人嘗試突破這種制約。²³

4. 語言親屬關係的判定取決於同源詞。首先，語言是一種結構和系統，詞匯不過是這種結構和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以部分代替整體，是以偏概全，更何況語音和語法，特別是語法，作為語言特點的本質，是語言中最穩固的部分，把它們排除在識別同源關係的原則之外，在方法上是不合理的；其次，詞匯是語言中最活躍和開放的部分，無論形式和內容發展變化最快，相互影響和交流的情況最複雜，追溯的層次越高，同源詞越少，它們與借詞和「底層」詞越難區別，特別對於沒有文獻的語言，操作過程中困難就更大。既不考慮語言的借用、換用和融合等複雜的結構和功能變換情況，也不考慮語言使用者的歷史和相互關係，只根據少量關係詞，貿然判定同源關係，其合理和可靠性可想而知。

通過上述研究，我們可以認識到語言的發生和發展都是多元的格局，語言的譜系關係不是一種單向的分化關係，而是一種多源的相對歷史關係，隨著語言結構、功能、使用和性質的變化，語言的譜系或歷史關係是可以改變的，在同源關係的識別上，更不能僅僅依據同源詞而是要考慮語言結構和系統的整體，並得到語言使用者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變遷的驗證，這樣，漢藏語言的系屬分類才可望得到科學和合理的解決。

漢藏語言共時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是雙語問題。雙語關係不僅是語言問題，還是社會、民族、政治、歷史、文化等關係在語言使用上的一種反映。雙語研究包括功能和結構兩個方面，漢藏語言雙語的功能研究主要是標準語和族際共同語問題。中國的雙語主要是指漢語和民族語，漢語作為全國通用的語言，在政治上

23 戴慶廈等〈關於我國藏緬語族屬分類問題〉，《藏緬語族語言研究》，雲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

與民族語言具有平等的地位，在功能上卻處於不同的層次，漢語不僅漢族使用，還使用於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少數民族內部不同語言集團之間，是各民族之間共同使用的族際共同語。多民族和多語言國家的族際共同語產生於各民族語言之中，一般是主體民族的語言或政治、經濟、文化上佔主導地位的民族語言，這種語言使用人口多，通行地區廣，在歷史上其他民族有學習和使用的傳統，在現實生活中按照各民族的意願有向族際共同語發展的趨勢，漢語作為族際共同語不僅是由於漢族作為主體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主導地位，以及漢語在經濟生產和科技文化發展上的先進性質，而且在歷史上我國各民族有互相學習和使用漢語的傳統，特別是少數民族有學習和使用漢語漢文的傳統。我國 55 個少數民族中約近一半以上使用或局部使用漢語，加之，我國尚有一半少數民族沒有文字，目前又不具備創造文字的條件，他們將要以漢文作為主要書面交際工具，作為獲取知識、進行教育、發展文化和繁榮經濟的主要手段，因此選擇漢語作為族際共同語不僅是現實的需要，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族際共同語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是少數民族雙語制形成的過程，關係到在一定社會制度和民族關係基礎上形成的語言關係的性質和特點、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和發展、規範和規劃以及民族教育等各個方面，是雙語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雙語的使用和發展不僅不會影響民族語言的地位和獨立性，只會在長期共存中互相豐富、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當然這需要更有更加完備的語言政策、語言規劃和語言立法。這也是雙語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與族際共同語有關的還有標準語問題。標準語是一個民族內部使用的共同語，即族內共同語。族內共同語的選擇和規範常常受到族際共同語的影響和制約，如上文所述，民族內部的不同語言集團之間往往使用漢語作為共同的交際工具，因此當一個民族內部方言差別極大，或是並用幾種語言，隨著族際共同語的傳播和普及，同一民族使用的不同語言或差別很大的方言又沒有統一和集中的趨勢，無論是口頭或書面的統一標準語的形成已不現實，如果需要創造文字，統一的基礎方言和標準音的選擇已不可能，標準語的選擇就趨於多元化，因為強制創造和使用一種文字，只能阻礙民族文化的發展，延緩落後面貌的改變，是不利於民族的發展和繁榮的。

從理論上說，無論族際或族內的共同語在功能上都具有層次性，取決於傳播的範圍，通行於一定的地域，根據我國少數民族的具體社會和語言使用情況，選擇不同層次的標準語，已成為解決我國民族文字的一項成功經驗。如苗族創造的4種方言文字，傣族改進的兩種方言文字，景頗族創造兩種不同語言的文字等，此外像彝族和瑤族等文字的解決都有這種多元化的趨勢。有時候口頭和書面的標準語並不統一，特別是有古老文字的民族，書面語屬於文言的性質，而口頭的標準語卻有方言集中的趨勢，如藏族的語言和文字，口頭的標準語是向衛藏方言的拉薩語靠攏的。

雙語的結構研究常常只局限於語言的影響，在我國更是只注重漢語對民族語言的影響，近年來逐漸重視民族語言對漢語的影響，而且進入到語言結構的較深層次，取得一定的成果。語言影響是語言豐富發展的重要手段和必由之途，也是語言深層次變化的前提和條件。語言影響是一種語言滲透現象，語言特征的轉移是在語言接觸過程中完成的，語言的一般接觸，即在一般交流需要的基礎上，單向或雙向地學習對方的語言，既對熟練和準確的程度沒有一定的要求，使用的範圍只限於局部和暫時的交流需要，使用人數對兩種語言的使用者來說也是少數，這種語言接觸所產生的語言影響只涉及淺層次的特徵，如語詞的借用、個別語音的吸收等；語言深層次的影響必定通過雙語階段，即大多數人單向或雙向比較熟練地掌握對方的語言，而且兩種語言都作為日常交際的重要工具，直到滲入家庭內部。由於兩種語言常常有主次之分，特徵相互轉移的程度並不相同，但都能涉及到核心語詞的借用、語音系統的調整或語法結構的改變等系統、結構等深層次的滲透。這是由於雙語制的確立，語言接觸也即語言學習、使用的深度、廣度和頻度決定的。語言的換用是又一種語言功能關係，語言使用者放棄原來使用的語言換用另外一種語言，也必定要經過一個雙語階段，發生深層次的語言影響，在語言換用以後這種影響又作為「底層」在換用語言中保存下來，「底層」現象的深入性正是取決語言影響的深刻性，而語言影響的發生及其深入程度則是由雙語關係決定的，因此語言的「底層」研究與雙語和語言影響密不可分。青海在歷史上曾是各族雜居、文化融匯、語言交流的地方，有人認為青海漢語中獨特的介詞

「哈(xa)」、「啦(la)」等就是「阿爾泰底層現象的反映形式，受阿爾泰系語言的影響所致」，²⁴ 也有人認為它們是藏緬語言的底層成分，從而推論彝語源於古羌。彝族源於羌的說法跟當今漢語伏羌話、河州話、青海話中的獨特語言成分與藏緬語言特點相同或相類似的語言事實正好相合。這對探求藏緬語言底層的研究是有啓示的。²⁵ 語言底層研究必須要有民族底層為前提，因此語言底層研究不僅有助於語言的深化研究，而且可以揭示民族發展史的歷程。語言的影響還有一個特例，即語言的融合，兩種語言相互影響，發生質變，成為一種新的語言，這也是一種語言換用，只不過換用了一種新的語言，在融合或換用之前同樣要經過一個雙語階段，發生深層次的語言影響，以致根據留存在換用語言中的「底層」無法再識別原來語言的面貌或無法判定應為原來哪一種語言系統。漢藏語言的系屬研究中，壯侗、苗瑤語言、五屯話乃至白語，如果不考慮他們歷時的雙語關係，恐怕很難解決他們的系屬問題。

語言功能關係研究中還有一個比較難解決的問題語言和方言的問題。這不僅影響共時的分類，還影響到歷時的分類研究。語言和方言的劃分所以成為難題，是因為：（1）語言使用者人為的干擾，混淆了民族學或歷史學與語言學分類的界限。因此語言學界流行一種虛無的態度，認為語言和方言的劃分不是語言學問題，語言和方言不可也不必劃分。歐洲的荷蘭語和德語，漢藏語言的壯語和布依語，都是明顯的例子。語言和方言不是能不能和要不要分的問題，而是必須區分，因為在歷時研究中它常常影響語言系屬和語音史的研究，在共時研究中又使語言分類失去基本准則，而科學分類是科學研究的必由之途，很難設想在無法說明語言事實的基本差異並據此作出科學分類時，能對語言作出科學的描寫和正確的比較。近年來，在漢藏語言研究中，不斷有人提出將民族和語言區別開來，把結構差異作為劃分語言和方言的基本原則，民族和歷史的因素只作為一種驗證。語言像任何科學研究的對象一樣，可作多角度的分類，把語言的民族學或歷史學分類

24 李克郁〈青海漢語中某些阿爾泰語言成分〉，《民族語文》1989年第3期。

25 王天佐〈漢語伏羌話虛詞le³³—藏緬語言的「底層」成分〉，《民族語文研究新探》，中國民族語言學會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與語言學分類區別開來，不僅確保了語言學研究的獨立性，而且加強了語言學的基礎研究。（2）對方言概念的誤解。傳統將方言作為語言的地方變體，與空間聯係起來，這顯然是不準確的，因為同一地域方言雜處，甚至語言共存的現象比比皆是，不同空間只是方言存在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方言是語言的一種結構變體，產生的原因不是地域的變化而是語言接觸的變化，這裏接觸的概念有兩層意思：一是原來相同的方言脫離接觸，二是脫離接觸的方言與其他語言或方言發生接觸。離開了語言接觸的概念就沒有方言的存在。當然，有民族共同語或標準語的方言，方言與標準語還有功能的差異，但這不是本質的差異，因為從理論上說，任何一種方言都有成為標準語的資格。（3）對劃分語言或方言標準上的分歧。目前語言分類研究上，還缺乏科學的量化手段，分類缺乏統一的標準。即使標準統一，對核心詞和基本語法手段及其使用範圍和頻率也有不同的看法，劃分的結果就不相同。近年來，漢藏語言調查研究中新的語言和方言不斷有所發現，語言識別和方言劃分任務艱巨，語言和方言關係的研究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三

漢藏語言的研究已經有半個多世紀，取得卓越的成就，並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科，中國也成為漢藏語言研究的中心，但漢藏語言的研究還遠遠落後於印歐語言的研究，更落後於中國社會發展對語言研究所提出的要求。漢藏語言研究的落後主要在理論和方法的層面，因此如何深入開展漢藏語言研究並使它與世界語言研究接軌，首先要探討的是研究的方法和方向問題。

總的來說，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是一致的，一種好的理論和方法具有普遍性，適用於一切語言，這樣的理論產生於廣泛的語言實踐基礎。由於世界語言的複雜性和研究的不平衡性，大多數語言尚未得到應有的研究，語言理論和方法的創建往往局限於少數語言，以這樣的理論和方法來指導地域各異、系統不同的眾多語言，就會常常遇到格格不入的情況，為此不少語言研究者提出探討適合研究

不同語言的理論和方法，比如研究印第安語言或漢藏語言的理論和方法。僅就上述這種意義上來說，這種提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麼什麼是語言的特點和適合不同語言的理論和方法呢？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是能指和所指關係的總和，不同語言能指的表述形式千變萬化，表述的方法卻是有限的，語言特點指的是這種表述的方法而不是表述形式，語言的理論和方法也是探討這種表述的方法而不是形式。漢語稱「馬」為「ma」，英語為「horse」，就語音來說，語言理論和方法要研究的是漢語和英語如何用「ma」和「horse」表達「馬」的意義，而不是研究漢語和英語為什麼用「ma」和「horse」表達「馬」的意義。漢藏語言的語音研究中，根據語音的結構特點，以聲韻為基本表述單位，將聲調視作與聲韻等同的獨立語音要素，並根據語言和方言差異的複雜性，在語音系統的整理和描寫過程中突出歷史主義的原則，即以語音的歷史面貌為樞紐，將語音的共時和歷時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這些都是根據漢藏語言語音的音系學特徵所創建的語音研究理論和方法；漢藏語言的語法研究卻還不盡人意，無論使用功能、結構層次還是生成的方法，都還未能將語法的形式和手段及其與所表達的語言意義之間的關係充分揭示出來。漢藏語言是一種缺乏形態的語言，確定語法基本結構單位以及不同結構單位之間關係十分困難，如果以詞為基本結構單位，作為主要語法手段的虛詞卻又不是詞的專有成分，漢語研究中詞無定類或詞本無類等等的說法，都是為擺脫這種窘境的權宜之計。即使詞有定類，詞作為基本結構單位的功能特性，用詞序和虛詞這些明顯的語法形式和手段又無法充分解釋和說明，於是引進「語義」和「語用」而成「語法」、「語義」和「語用」的「三位一體說」，開闊了研究視界，增強了解釋和說明的力量，但還是未能充分揭示漢藏語言語法的基本結構特點。近年來，無論是漢語還是民族語言研究界都有人提出以詞組或短語作為漢藏語言語法的基本結構單位，強調了詞、詞組和句子結構的一致性，都是從探索漢藏語言語法的基本特點出發的，應該說在科學研究漢藏語言語法的道路上前進了一步。科學地研究漢藏語言首先必須研究漢藏語言的基本特點，然後才利用適合漢藏語言的已有語言學理論和方法或創建一些新的理論和方法。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漢藏語言衆多，語言情況複雜，既給研究帶來一定的困難，也爲比較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漢藏語言研究歷來分爲漢語和非漢語的民族語言兩個領域，相互缺乏密切的交流，沒有充分利用對方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漢語具有豐碩的歷史文獻資料，悠久的研究傳統，廣泛的研究基礎，卓越的研究成果，而民族語言除藏、彝、納西、傣等少數語言外，缺乏文獻資料，卻有遠勝漢語方言的豐富多樣的口頭語言材料，保留了更多漢藏語言古老的語言現象，近半個世紀來，也取得了蔚然可觀的成就。漢藏語系的確立、漢藏共同語的構擬、系屬的分類和歸屬都需要漢語古老的歷史資料，這些資料常常在衆多的比較資料中起到「定位」的作用；而漢語的研究特別是歷史研究中，不少難題通過與民族語言的比較常常可以迎刃而解，有時參考民族語言的研究成果也能得到有益的啓發。比如《切韻》齊、蕭、先、青、添等四等韻主要元音的構擬，由於在方言中反映出由高到低的不同元音形式，歷來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如果與壯侗語言的長短元音進行比較，因爲這些語言的長高元音後面常常帶有一個過渡音，在語音發展過程中這些過渡音又常常演變爲主要元音，因此漢語的四等韻完全可以構擬爲一個長的*i*：元音，而在語音發展過程中*i*變爲介音，過渡音成爲主要元音，這樣現代方言中主要元音的各種不同形式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釋。²⁶ 再如，漢語語音史研究中，由於文獻資料中鼻音、邊音與喉擦音通諧，成爲聲母構擬的一大難題，但如比較藏緬語言和苗瑤語言聲母中清化的鼻音和邊音系統，以及這些清化音在不同的語言或方言中演變爲鼻音、邊音或喉擦音聲母的情況，爲漢語構擬一套清化的鼻音和邊音聲母，不易理解的通諧就能得到科學的說明。²⁷ 民族語言的研究同樣要借助於與其他民族語言的比較，比如撒尼彝語「十」是「*tshi*³³」，當個位數與「十」構成十位數時，所有「十」都讀「*tshi*³³」，唯獨「二十」中的「十」讀不送氣的「*tsi*³³」，這種不規則的語音變化現象如果只憑借彝語本身是無法解釋的，但如果與彝語支其他語言以及藏緬語言進行比較，即可知撒尼彝語的個位數

26 馬學良、羅季光〈切韻純四等韻的主要元音〉，《中國語文》，1962年第12期。

27 馬學良〈漢藏語系語言對於加深漢語研究的作用〉，《民族語文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

n³³「二」，原來是有帶有韻尾-t或-s的，正是這種韻尾的影響，使後接音節的聲母由送氣音變為不送氣音。²⁸ 溝通漢語與民族語言之間的研究，開展漢語與民族語言以及民族語言之間的共時和歷時的比較，是漢藏語言研究的一種基本方法，而且通過這種比較，也有利於語言的區域共同性現象的研究，甚至語言普遍性現象的研究，從而對語言的發生發展、擴散、變異和共性等語言理論研究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十世紀的科學出現了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而以綜合為主的發展新趨勢，不同學科之間的整合化，使科學發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在語言學科的發展中，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數理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等等新學科的出現，變換研究視角，擴大研究領域，通過理論借鑒、內容滲透、方法引用等途徑，出現了大量新思想、新概念、新內容、新方法，使語言研究進入一個新時代。嚴格來說，科學的整合可分為全面結合，即上述新學科的產生，和局部結合，即不同學科之間的溝通、借鑒和滲透。漢藏語言研究中，歷來提倡與其他學科的結合，如與民族學、宗教學、歷史學、文化學、考古學、民間文學、民俗學等結合。²⁹ 像藏族、彝族、納西、傣族的語言文字的研究離不開宗教，大多無文字的民族語的研究，更要求助於民間文學、民俗學的幫助，很多現代語言中已經消失的古老語言現象，經常保存在口頭文學或民俗民風中。至於漢藏語系發生學和系屬分類的研究這樣的難題，更無法完全依靠語言的資料來解決，不得不借助於民族學、歷史學、考古學、文化學資料的驗證。近年來，在壯侗苗瑤語言的系屬分類研究中，通過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史、文化史和古代民族關係史等的研究，論證了使用這些語言的民族原來就共同生息蕃衍以及與境外民族一脈相承的關係，從而提出了漢藏泰澳語系的新假設，³⁰ 應該說是跨學科綜合研究的一個比較成功的

28 馬學良〈彝語「二十」、「七十」的音變〉，《民族語文》1980年第1期。

29 馬學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語言學〉，《民族語文》，1991年第6期；〈論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語言學、民族學的關係〉，《少數民族文藝研究》，中央民族學院文學藝術研究所編，1982年；〈民俗學、民間文學離不開語言學〉，《中國民俗學會論文集》，1984年。

30 邢公畹〈漢藏系語言及其民族史前情況試析〉，《語言研究》，1984年第2期。

例子。不同學科的結合和交流，相互溝通和借鑒，是科學發展的潮流和趨勢，也是漢藏語言研究的一種重要手段和必由之途。

當然，在漢藏語言研究中要吸收其他學科的先進研究方法還很多，比如科學的量化方法，準確的統計方法，邏輯式的表述方法，綜合的社會調查方法，儀器的實驗方法，計算機的信息處理方法等等，因為在漢藏語言研究中，系屬分類、語言與方言、語法的描寫和分析、語言的構擬和比較、聲調的發生和發展、新語言的發現和調查等傳統的課題還需深入進行，特別是綜合的和歷史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至於像語言的關係、語言的發展、語言的擴散、變異、語言的信息處理、語義語用、語音實驗等方面更有待開拓，這些研究都離不開新理論和新方法的支持。漢藏語言研究必須與世界語言研究接軌，在與世界語言研究的同步發展中達到一個新水平。

Notes on Major Topics on Research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Ma Xueliang

Sino-Tibetan(ST) languages include the major languages spoken by various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and important languages used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re has always been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research on ST languages. China has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ST languages, making it a principal region of ST languages. Chinese research into ST languages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progress in the field has been especially substantial since 1949. Chinese research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has succeeded in elucidating the basic situation of ST languages and dialects, has resolved the practical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writing systems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has enriched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general linguistics. Moreover, it has ma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phonology, typology, the study of language relationships, and other sub-fields.

The present paper discusses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field of ST linguistics: genetic classification, lingua franca and languages common to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standard varieties of languages,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 and the "language or dialect" problem. It also suggests some important methods and ways of studying ST languag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ST languages, sharing notes between the study of Chinese and the study of minority languages, promoting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Chinese and minority languages and among minority languages themselv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associ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disciplines.